

二之料材攷參習學部幹

義主列、馬了離脫導領共南
論理的爭鬪級階和級階於關



行印店書北東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脫離了

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

馬克思、列寧學說之所以萬能，就是因為它是正確的。它已經受了百年以上的工人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史的考驗，已在俄國取得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全世界歷史性的勝利，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列寧思想的無敵的力量已在人民民主國家的建設中，在日益高漲的全世界數萬萬被壓迫被剝削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束縛，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裏得到了證明。

在這爭取人類未來幸福的偉大歷史戰鬥中，比任何時候都迫切的需要加強一切國家的工人統一戰綫，和團結一切共產黨的力量，以便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是以美國壟斷者爲首的，以反對蘇聯，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勞動者爲目的的軍事經濟聯盟。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鞏固，全世界勞動者的團結，只有在堅定不移的馬列主義——工人階級世界觀——的基礎上，才有可能。一切脫離馬列主義的企圖，對於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嚴重的危險。

正因如此，情報局在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裏，指責了南共領導者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個觀點表現在最近期間，他在對內對外政策的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列主義的不正確的

路線。由於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得他們對蘇聯和聯共（布）黨進行着一種非友好的政策；就使得他們在內政方面：在工人階級領導作用問題的認識上墮落到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階段是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觀點上陷入機會主義的立場；並採取了對南國國民經濟有極壞影響的冒險主義、過左政策。這種反黨、反蘇聯的觀點，就使得南共領導者走上脫離反帝社會主義統一戰綫的道路，走上叛變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和轉入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衆所週知，馬列主義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工人階級的革命作用問題——工人階級是一切勞動者爭取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領袖。農民問題——這個工人階級同盟者的問題，應是附帶的從屬的問題。但同時，農民問題對於共產黨仍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問題，列寧曾在一九一九年指出：『一切革命和被壓迫階級運動的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都教導我們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統一並領導勞動人民，被剝削人民中的散漫的落後的階層。』（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俄文版十四頁）

這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應當是每個共產黨在革命實際活動中的指南。布爾塞維克黨會堅定不移的運用這個原則來領導工作，並曾給民粹主義、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和托洛茨基主義這些根本否認工人階級革命領導作用，否定工人階級能够領導農民的思想以致命的打擊。

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它的政治活動中是否應當執行馬列主義這一原則呢？毫無疑問的，應當無條件的執行。南共黨員是否能因農民在國民中佔大多數，就可以不把與農民基本羣衆建立聯盟的工人階級當做主要支柱，而以農民爲其主要支柱呢？如果是這樣的方向，就是不了解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和直接脫離了最重要的，最有決定意義的馬列主義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列寧說：『我們已和農民結成了聯盟，應了解這個聯盟就是無產階級把農民從資產階級的剝削下解放出來，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和影響下解放出來，並把他們吸引到無產階級這邊來，以便共同戰勝剝削者。而孟塞維克認爲：農民是大多數，我們——是純粹的民主主義者，因此大多數就是有決定作用的。……然而由於農民不能獨立自主，實際上沒有別的路，只有恢復到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版四百五十六頁）

在西歐一切國家裏，在人民民主主義的所有國家裏，連南斯拉夫也包括在內，唯一革命到底的力量，能於領導一切勞動者（首先就是一切農民基本羣衆）爲社會主義勝利而鬭爭的力量是工人階級，而不是農民。至於包括貧農和中農在內的農民大多數可以參加而且有的已經參加到工農聯盟中去。

一切共產黨，連南斯拉夫共產黨也在內，都必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這絕不等於說只有先進工人才能成爲共產黨員；共產黨還吸收着貧農、中農，以及知識分子中的先進的革命成份。然而，一切共產黨，連南共在內，都不應當是農民黨，這就是馬列主義的ABC，是不准許任何共產黨員忘記和忽略的起碼原則。南共的某些著名的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問題這一馬列主義道路面前，迷失了方向。馬列主義認爲在消滅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裏，工人是起領導作用的。南共黨的領導者所發展的則是完全相反的觀點。鐵托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薩卡列普公佈的下列談話裏（該談

話公佈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伯爾伯』雜誌），充分肯定的說：『我們向農民說，他們——是我國最堅固的基礎，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想得到他們的投票，而是因為，他們在事實上表現是這樣的。』

照鐵托這樣說法，現在南斯拉夫國家最堅固的基礎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鐵托這話不僅僅否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而且宣佈了一切農民，包括富農在內都已成為新南斯拉夫的『最堅固的基礎』了。

這還不明顯嗎？這種立場已直接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這個立場所產生的觀點，完全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和馬列主義是毫不相容的。

南共中央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是人民民主國家的指導者）的理論，也同時表現在對黨的作用和人民陣綫意義的完全錯誤的估計方面。大家知道，在南斯拉夫，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與工人，農民，進步知識分子並列的參加在人民陣綫裏。而南共黨的領導者不願意承認人民陣綫中起領導作用的應當是工人階級，這種否認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觀點，就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蛻變為半公開政黨的狀況。南共中央的領導者輕視職工會，把職工會視為人民陣綫的附庸組織。應成為『共產主義學校』（列寧語）的職工會，被降低為第三等組織，其活動範圍被縮小到僅能召集會議。熱德拉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竟聲稱『召集專門的職工會，專門的人民陣綫會議等等，都是十足錯誤和毫無意義。這些會議應合為一個會議，因為職工會是隸屬於人民陣綫內部的。』不久前，莫西·伯也得寫道：職工會（即工人階級）在南斯拉夫的解放鬥爭中沒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他們不能算是南斯拉夫國家政權體系中的重要力量。由於南共領導者們在最主要的問題上脫離了馬列主

義，就使他們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也就使他們不願意承認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在解放鬥爭中所曾表現過的，和在新南斯拉夫建設中正在表現着的英雄主義。實際上，這就是對工人階級的叛變行爲。

墮落到民粹主義和富農黨的道路上

由於南共中央領導者不承認工人階級是人民民主國家的領導者，認爲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最堅固的基礎』，南共領導者們就重演了可憐的、著名的『人民之友』（舊農民社會主義）的角色，就迷失了馬列主義的方向，而走向民粹主義和富農黨的道路上去。他們忽視了列寧反覆教導我們的話，列寧說：民主主義只有在工人階級裏能找到無條件的，堅決不移的，百折不回的擁護者。誰要是堅定地依靠着這個穩如泰山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他就能夠強大有力。誰要是一面自以爲是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建設者，一面又不以工人階級，却以農民爲其主要支柱，他就只能衰弱不堪和孤立無助。農民的民主主義除了自身走向分化以外，永遠都不能產生任何東西。墮落到保衛富農利益上去的俄國民粹主義者的歷史，就是這一道理的最好證例。然而南共領導者們却頑固的依據着這種理論，走上了民粹主義者的道路。

鐵托所發表的觀點，並不是新的，相反的，他是在重彈着很早以前就破壞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修正主義者的老調，這對於一切懂得馬列主義歷史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四年，在其著作『法蘭西和德意志農民問題』一文裏就堅決的批駁了法國社會主義者把保護全體農民的條文混雜

到南特斯克綱領中去的企圖，恩格斯指出：『這就是對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的直接違反。』在佛朗哥福爾特城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會上，修正主義者福利美爾曾以保衛農民利益（包括全體農民在內）的宣言企圖『收買農民』。恩格斯會斷然的駁斥了這種立場，並聲稱：『與這些思想絕對不能進行妥協，如果和他們妥協，就是違反我們的基本原則。』

然而，奇怪得很，在恩格斯說這話已超過一世紀的現在，居然還有把農民作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支柱』這樣的共產黨員出現。

鐵托和南共其他領導者們不僅否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而在農民階級性的問題方面還有着很多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農民是個一致的整體，而沒有看見農民中分貧農、中農、富農這些階級差別。南共的領導者甚至連富農這兩個字都不敢提到；當他們不得已說到農民的社會性時，他們就把自己限制在『農村裏有富裕農民』這樣毫無意義的空洞辭句裏。他們抹殺了馬列主義關於農民階級性，農民差別的學說。在這個問題上和在其他問題上一樣，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們脫離了馬列主義理論，忽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歷史經驗。

共產主義的偉大導師列寧、斯大林曾反覆教導我們說：布爾塞維克黨的豐富經驗，對後起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所作的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中曾說：『從國際的觀點看來，我們所企圖規定的握有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待資本主義最後的一個階級的態度，對待資本主義深刻基礎的態度，對待小私有財產以及小生產者的態度，已成為進步的綱領。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已擺在我們面前，我想我們定能解決這個任務。我們正在創造着經驗，這個

經驗將對後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有很大益處，使他們能更巧妙地、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版四百五十五頁）

這個報告裏同時提到農民特點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關於這點列寧曾說：工人階級爲了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就應當用一切辦法來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在這些原理中是沒有任何矛盾的。他說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是說明農民是特殊的階級，這個階級的經濟發展無論就生產工具或就生產手段來說都是建築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和工人階級根本不同；工人階級的經濟無論就生產工具或生產手段來說，都是建築在公有的社會主義財產的基礎之上的。同時列寧認爲『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的，自發的，大量的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俄文版一七三頁）

當然，農民小生產者的這一特點，對於組織工農聯盟並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礙。然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的工農聯盟不是工人階級和一切農民的聯盟，而應當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中勞動羣衆的聯盟。這個聯盟應當以向資產階級成份進行堅決鬥爭，向富農進行鬥爭爲前提。斯大林在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下發展了列寧這一關於工農聯盟的思想。斯大林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簡單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兩者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和消滅階級社會。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瞭解，都是機會主義，孟塞維克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叫做馬克思主義，不可叫做列寧主義。』（斯大林著：列寧主義

問題俄文本一九二頁

總之，由於南共領導者在這些問題方面不相信馬列主義，對上述農民問題，就不能了解，就把全體農民作為農村的主要支柱，並忘記了向富農階級進行鬥爭。

認為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機會主義觀點

南共領導者忽視了階級鬥爭和給農村資本主義成份以限制的問題；南共領導者在公開談話和文件裏，經常抹殺農村的階級區別，他們沒有動員南斯拉夫黨去克服那些因農村資本主義生長所產生的困難和障礙。

鐵托在其為動員五年計劃而作的談話裏，曾說到了農村經濟部門的任務，但是關於南斯拉夫農村裏的政治困難，關於富農所進行的反對人民政權的殘酷鬥爭，却都一字不提。他沒有號召與會的代表們提高警惕性，沒有向代表們警告：在國內，尤其是在農村裏，階級鬥爭將不可避免的更形劇烈；沒有揭露出富農階級向人民政權進攻的鬥爭形式和方法。在這樣的情形下，富農階級所發動的鬥爭就特別明顯的表現在去年進行徵糧工作的時候，這樣的事實很多：富農為企圖破壞徵糧工作計劃，曾故意毀掉他們所有的糧食，殺害了很多黨的和人民政權中的工作人員，富農分子曾打入到人民政權的地方機關裏，進行着各種各樣的罪惡行為，企圖藉此引起勞動農民對政權組織的不滿情緒。

在去年的戰時軍人代表會議上，鐵托曾承認了人民政權組織，在進行徵糧工作時，犯了嚴重的錯

誤，指出了很多向貧苦農民和烈士家屬徵收公糧的現象，鐵托聲明將把這些糧食發還給貧苦農民，錯誤將會得到糾正。但是他却沒有分析爲什麼會犯這些錯誤，沒有根據南斯拉夫農村階級的鬥爭日趨劇烈的觀點來解剖錯誤的原因。

南共領導者對富農階級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和可能性認識不足，富農階級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經在瘋狂的反抗南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南共領導者忽視了列寧斯大林關於黨應當使工人階級和農村被剝削羣衆提高警覺，提高他們的戰鬥力，發揚他們隨時隨地響應號召的精神準備，以便去進行反對城、鄉資本主義成份和反對反抗我們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的指示。

他們從機會主義觀點出發，否認目前南國條件下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的加劇，似乎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同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日趨削弱，如像布哈林分子們所鼓吹的資本主義會『和平成長』爲社會主義的腐朽理論一樣。

某些南斯拉夫的政治工作者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宣傳着反馬克思理論的自流主義。

例如，南斯拉夫對外貿易部部長，尼古拉·彼得羅維奇，在他的『發展南斯拉夫人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論文（該文公佈於『斯拉夫人』雜誌一九四七年五號）中寫道：

『農民經濟對於社會主義部門的發展，並不是不可克服的和本質的障礙。它是和社會主義部門密切結合在總的經濟計劃以內的，在這個經濟計劃的實施過程中它自然會逐漸改變自己的性質。和逐漸前進成爲徹底消滅了經濟法則中的自發現象的部門。』（十九頁）

照他這樣說，那麼南斯拉夫農村中的小農經濟和富農經濟就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的障礙』，這種農村經濟『自然會逐漸改變自己的性質』，這個理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已是再清楚沒有的了。

階級鬭爭的不斷尖銳化，已成為人民民主國家（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發展的必然規律，南共領導者忘記了這一真理，並失掉了領導全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能力。

政策上的冒險主義

南共領導者在政策上沒有堅定的原則上的依照馬克思主義方式來製定政治路線，他們經常從一個方向搖擺到另一方向去，時而右傾，時而『左』傾。在聯共（布）中央批評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成份發展估計過低和在本國宣傳階級鬭爭日趨削弱理論的錯誤之後，南共領導者就迅速的採取了對策，以便證明這種批評是『不公正』的。爲了證明在南斯拉夫已充分的消滅了反動派的基礎，他們就通過了包括小工商業國有化在內的，補充國有化法令。這種法令由於毫無準備工作和匆忙進行的原因，只能使南國人民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的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令，這種法令也是毫無準備的，因此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近，南斯拉夫領導者更充分自信地頒佈了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

情報局在決議裏公正的指出，南共領導者之在南國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只能是冒險的行爲，

因爲當着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還存在時，當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的時候，是絕對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南共領導者的這種冒險政策是由於他們否認了馬列主義關於消滅階級鬥爭必經過程的理論，和忽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而產生的。聯共（布）黨的經驗證明：只有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爲階級是農村社會主義建設和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構成部份，一切以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這一任務的企圖，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冒險性，都不能免於預先註定了的失敗命運。

大家都知道，蘇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曾進行了怎樣深刻的革命改革。資產階級及地主都被肅清，一切土地、工廠、銀行、交通運輸等都進行了國有化，在殘酷的貧、富農間的階級鬥爭中，富農的基礎被强有力的摧毀了，大部份貧農都得到了巨大的勝利果實，都被提高到中農的水準，整個鄉村都中農化了。然而聯共（布）黨任何時候都沒有依據這些事實做出農村階級鬥爭日趨削弱的結論或是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可以消滅全國資本主義殘餘的結論。列寧指出：『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經濟國家裏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就有着比共產主義還堅固的基礎。』

同樣，大家也知道，在十月革命後十五年的過程裏，都是這樣，首先是限制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然後才消滅富農之爲階級，十五年中這兩個步驟，一直沒有離開過布爾塞維克黨的議程。

莫洛托夫同志在聯共（布）黨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說：『黨在新經濟政策進行的整個時期內，堅決的執行了限制資本主義成份發展的政策——其辦法是：進行農業累進稅制，限制地租，擴展農村經濟中僱傭勞動的利益，用信用借貸來扶助困難的經濟單位，以及執行一切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包括強力

扶植國家工業等在內)。然而，我們的任務是——在鄉村和城市一樣徹底克服和消滅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簡單來說，這不是別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

列寧、斯大林黨實行了限制和排擠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之後，黨就把貧農和中農團結到自己周圍，就孤立了富農，也就為基本農民羣衆根本轉入集體化道路準備了必要的前提。

當這些前提都已形成之後，黨就把限制排擠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轉變為在全面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這個政策已取得了集體農莊制全世界歷史性的空前勝利。

對聯共（布）黨，這種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基本條件的經驗估計過低，就在南斯拉夫產生了重大的政治危險，犯了馬克思主義者不許可犯的錯誤。因為，單在城市和工業方面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必須在農村裏，在農業經濟方面，同時進行。

南共領導者最近期間執行的「左」傾政策已經超過了限制資本主義成份的任務。這些冒險主義的政策是不能適應目前南斯拉夫的實際情況的，這些辦法只有進一步的使工農聯盟發生混亂。

對合作社制度的右傾機會主義了解

任何人都都不想像降低南斯拉夫土地改革的意義，然而我們如果過高的評價了這個土地改革的效果也會產生很大的危險。

關於土地改革的效果，卡迭爾曾於在波蘭舉行的情報局會上曾宣佈說：「土地改革更加使人民政

權與勞動羣衆接近，並使鄉村富有的投機份子陷於孤立，這樣，當然就根本給鄉村中全部資本主義成份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土地改革大大減弱了他們對小農生產者的壓力，並用一定的界限，限制了他們的發展。」

可是，南斯拉夫農村的實際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一點能令人心滿意足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素稱農業國（務農人民佔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南斯拉夫農業經濟，目前仍然是一片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南斯拉夫的土地沒有實行國有化，仍然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南共領導者認為實行土地國有在南斯拉夫是不適合的。企圖在土地私有財產制的原則下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南斯拉夫有將近二百萬佔地不過五海克脫的農民。與這些農民同時存在的是大規模的富農經濟，因為依據一九四六年推行的土地改革法令，最多土地的佔有者，可以佔有十五——三十五海克脫可耕地。由此可見目前南斯拉夫農村經濟中存在着富農經濟發展的很大的可能性。而這些富農經濟，就是反動派在農村裏的基礎。

南共領導者們，經常以工業國有化，發展農村合作社，『給我國資產階級份子的經濟力量以致命打擊』（卡達爾語）等話來安慰自己。由於南共領導者曲解了列寧、斯大林合作社計劃的原則，他們就過高的評價了南斯拉夫反對資本主義成份的鬭爭，這種過高評價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很大的害處。

南斯拉夫的農業合作社，在組織方面還很脆弱，還不能很好的進行工作，還只限於交換的範圍，還不能進行任何較大的生產；還不能改變小商品生產的基礎。而這個小商品生產就正是資本主義成份的最深刻的基礎，卡達爾否認了消費和日用品供給合作社不能給農村資本主義成份以『致命打擊』這

個衆所週知的事實。

而且，即令，這種消費、日用品合作社能够廣泛的供給個體農民經濟，資本主義成份在生產範圍方面仍能發展起來。由於富農在大生產方面佔着優勢，他就排擠着小農和最小的農民經濟，使他們在競爭中毫無出路。

我們應當再次記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時候，社會主義部門，佔全國貿易方面比重的百分之八十一·九，合作社和國家經營的部門已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三。然而，這還不能說富農經濟已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聯共（布）黨堅決的警告着資本主義成份迅速發展的危險性，在一九二七年底，聯共（布）黨第十五次大會上莫洛托夫同志說：『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就在於目前富農仍佔有超越於集體經濟的優勢，因此富農經濟還在打擊着力量微弱的和中等的經濟。我們的農村經濟中的基本矛盾就在於此。我們無論如何，應爲貧農和中農找一條出路。』

列寧，斯大林黨在農業經濟的集體化方面，在小農經濟生產合作社方面爲貧農和中農找到了出路。

南共領導者過高的估計了消費、日用品供給合作社的意義，並把它與生產合作社對立起來，他們這種態度是和馬列主義毫不相容的。列寧，斯大林的合作社計劃認爲普通形式的合作社，乃是集體化的前提之一。只有集體化的農業經濟，在粉碎農村資本主義成份的工作中才有決定意義。

列寧，斯大林的合作社計劃：就是建設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重工業，以便用技術來供給農村經濟。把農民羣衆的最普通的合作社形式，從交換合作社的範圍，提高爲生產合作社，也就是走向集體農莊的

道路，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給富農以致命打擊』和建設社會主義。

由上述問題裏可以看出，南共領導者脫離了馬列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這對於南共黨，南斯拉夫人民有着嚴重的危險。脫離了馬列主義，就使得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裝，使得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有蛻化爲資產階級國家的危險。

（葉羣譯自七月十五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

匈共底思想、理論工作問題

拉科西作

共產黨的政策是受理論所指導的，這個理論爲馬克思所精心製成，並且在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爲列寧和斯大林所進一步發展與運用。斯大林同志說，這一理論要求黨在一定的時候，應當能找到進程鎖鍊中的特殊環節，一旦抓着這個環節，就可能掌握整個的鎖鍊，準備達成戰略勝利的條件。斯大林同志又說，關鍵在於能夠判斷面對着黨的各種任務中那一件是迫切的，而解決這一任務是中心問題並保證勝利地實現一切其他的任務。

根據以上所述來回顧匈牙利共產黨在解放後的工作，表現在每一固定時期中我們能找到鎖鍊上的相當環節。剛剛解放後的一個時期的主要問題，是保證民主力量的鞏固。建立匈牙利民主的次一環節是土地改革，繼之而來的是經濟恢復。一九四五年的選舉表明，反動派不僅在政治上嚴重地威脅我

們的民主基礎，而且還以貨幣貶值在經濟上威脅它。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黨認為需要結束通貨膨脹、穩定貨幣，把這當做重要的一環。引證列寧的話來說就是必須用一切辦法握緊它，以保持整個的鎖鍊並澈底準備過渡到下一環節。穩定幣制的成功加強了我們民主的經濟基礎，幫助擊敗了盤踞在小地主黨中的反動派。緊跟着的是國有化的措施和三年計劃。在匈牙利由民主發展中的經濟與政治成就，提供了兩工人政黨合併與鞏固全國民主陣綫的條件。這是今天面對着我們的任務。

提高黨員底理論水平

鎖鍊底次一環節，毫無問題地是提高我們黨底思想與理論水平。列寧的教訓——只有為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執行前衛戰士的任務——在今天其正確性一如當時。在過去三年中，黨會忙於每日的工作，它只能對理論訓練給以極少的注意。我們還沒有把根據列寧——斯大林的方法來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還沒有對有關匈牙利民主之生長的主要問題加以澈底的研究。列寧曾經說，共產黨人如果不想落後的話，他必須經常地豐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必須承認，我們在鑽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面沒有給予必要的注意。我們為一種危險所威脅，關於這種危險斯大林同志曾經說：如果因為種種原因黨的宣傳開始發生缺陷，如果黨的幹部底馬列主義的教育開始蒙受損失，如果提高這些幹部政治、思想水平的工作變為軟弱無力，並且因此幹部對黨的前進運動的遠景不再感到興趣，不再懂得黨底事業的正義性，而變成沒有前途的人……那就是說一切政府